

中国历史 学年鉴

简 本

1981

中国历史学年鉴

简 本



本书由林言椒负责具体编辑。王庆成、叶青谷应邀参加了全书编辑工作。协助编辑工作的有邓卫中、乔还田、张秀平、陈有和、徐公义。

中国历史学年鉴

(1981年版,简本)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437,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900

书号11001·458 定价1.25元

目 录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历史学笔谈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郑天挺	1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	周谷城	3
要认真读点书	白寿彝	8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刘大年	10

一 年 史 学 研 究

先秦史	唐嘉弘	15
秦汉史	林剑鸣	23
魏晋南北朝史	何兹全 曹文柱	29
隋唐史	杨志玖	38
宋辽金史	吴 泰	47
元 史	邱树森	56
明 史	傅衣凌 林仁川	62
清 史	王鍾翰 冯元魁	70
太平天国史	茅家琦	76
洋务运动	夏东元	84
戊戌变法	汤志钧	93
义和团运动	路 遥	101
辛亥革命	陈旭麓 何泽福	109
北洋军阀和反北洋军阀斗争	来新夏	118
现代革命史	彭 明	121
考古学	王世民	129
古代经济史	宁 可	137
哲学史	金春峰	142
军事史	舒 翼	153
史学史	朱仲玉	161

II 目 录

历史地理学	马正林	166
历史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历史	严敦杰	173
近代中外关系史	赵 澄	177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	丁伟志	182
亚细亚生产方式	张作耀	190
中国史论文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199

一 年 新 书

中国史著作、论文集选介	史 枚	293
中国史稿(第三册)	293	中国通史纲要
中国古代史(上、中、下册)	293	293
宋史丛考	293	简明清史(第一册)
明史考证(第二册)	294	295
明史简述	294	清史简述
清史简编(上编)	294	295
		清史论丛(第二辑)
		295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295	春秋左传研究
史学杂稿续存	296	296
探微集	296	汉简臆谈及其它
		297
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	297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
中国经济史问题论纲	298	刊(第一辑)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299
(第一卷)	298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
中国史学史论集	298	(第一卷)
中国古代史学史	298	300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第一集)	299	(第二辑)
		300
民族史论丛	300	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		文集
研究	301	301
		壮族简史
		301
		畲族简史
		302
贵州史专题考	302	新疆简史(第一、二册)
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	302	303

中亚史(第一卷)	303	
辛亥革命史(上册)	303	五四运动简史 304
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	304	
梁启超传	304	黄兴年谱 305
孙中山年谱	304	蔡元培年谱 305
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	305	
历史古籍和专题资料的出版		傅璇琮 306
近代史资料的出版		文心鹿 310
中国历史新书、再版书书目辑览		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 314

一年文物考古新发现

安徽省和县龙潭洞猿人 头骨	322	山西省太谷县白燕遗址	323
河南省长葛县石固遗 址	322	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古 城遗址	323
陕西省武功县浒西庄遗 址	322	内蒙昭盟林西砂窝子、锅 撑子山遗址再考察	323
湖北省枝江县关庙山新 石器时代遗址	322	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 址发掘的新收获	324
安徽省潜山县薛家岗遗 址	322	山西龙山文化白灰面房 址	324
山西省临汾县陶寺遗址	323	安阳大司空村和三家庄 新发掘的殷墓	324
江苏省连云港市将军崖 岩画	324	周原发现西周墓地	325
寺洼文化和徐家碾先周 文化继续发现	324	陕西省扶风县发现西周 中晚期甲骨文	325
陕西省淳化县出土西周 大圆鼎	325	陕西省凤翔县发现十座 秦公陵园	326
陕西省扶风县召陈村北 发现一组大型西周建 筑基址	325	辽宁省新金县的双房石 棚和石盖石棺墓	326
		安徽省舒城县九女墩古墓	326
		湖南省临澧县发掘一座	

IV 目 录

战国木椁墓	326	汉代未央宫前殿遗址初	
四川省新都县战国墓	326	步探明	328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继续		嘎仙洞鲜卑石室	328
进行发掘	326	唐代青龙寺和九成宫的	
秦始皇陵西侧发现铜人、		发掘	328
铜车马	327	新疆吉木萨尔县高昌回	
吉林省榆树县古墓	327	鹘时期佛教寺庙遗址	329
江苏省高邮县发掘一座		龙泉县安福村龙泉窑址	
大型汉墓	327	的发掘	329
孔望山摩崖佛教画像石刻	327	辽宁省盖县路西金墓	330
洛阳出土北魏石经残块		北京市丰台区金乌古论	
一百五十三块	327	窝论墓	330
编后记			331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历史学笔谈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郑天挺

一九八〇年是中国历史学界繁荣的一年。

在这一年，至少有三种情况值得我们高兴和重视。

首先表现在历史学界的大团结。

一九八〇年全国历史学界先后组成了全国的和地方有关历史学各种专门学会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不下四十个。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受到干扰破坏，被迫中断多年的中国史学会在四月八日举行了代表大会，领导同志出席作了重要讲话，通过了会章，选举了理事会，通过了致台湾史学界书，讨论了今后工作，体现了全国历史工作者的大团结。

其次是中外历史学研究的广泛交流。一九八〇年全国各高等学校、各专门学会、各学术团体举行了有关历史学的大小学术讨论会，至少在七十次以上。广泛交流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不同的意见展开争鸣，将研究推向新的水平。许多学术讨论会都有国外历史学者参加。八月南开大学举行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六个国家和香港地区三十四位专家参加，十月北京举行自宋至一九〇〇年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有十四位美国专家参加，八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我国派了代表团，有十三位专家前往参加，都宣读了论文。

第三表现在国内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关于这方面的收获，更加辉煌，现在只谈六点：

一是解放思想。在这一年的历史学研究中，我们看到很多论文突破各种成见的束缚，深入思考，以追求真理，详细占有材料，广泛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从而形成了新风气。

大家认为，真理就是科学。历史既然是科学，就有它的科学方法、科学规律和科学发展。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指导。当然,从实际成果看,这方面我们作的还不够,还要刻苦地继续努力。

二是新人辈出。这一年的史学刊物,登载了不少新、老专家写的好文章,提供的好资料。此外我还在各个历史系的大学生、研究生,各中学老师,以及和我通信的同志(怨我未能按时作答)中,发现了很多历史学专家、历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而且多数是青年同志。这是历史界的新生力量,是历史界的可喜现象。他们在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带动下,新学风、新任务的启发鼓励下,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超越前人。我们应该多方面的协助他们。

三是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在历史工作和历史研究上,一九八〇年我们看到大家都在开辟新方向新途径,以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些还是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这就移动了我们的视野,伸延了我们的触角,从而使研究领域日益恢扩,伸入到边疆地区史、少数民族史、思想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和世界史,并且伸入到边缘科学跨学科领域。加强了出版、索引、翻译动态各项工作。有的虽然还处在初步阶段,但前途是无限的。一九八〇年不少地区举行了批判封建主义的学术讨论会,有的地区准备了举办中学生历史竞赛。这是历史界又一项新情况。

四是重视新方法。许多研究论文和科学讨论会普遍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呼声日高。大家都要求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同一事态的发展,要求注意历史环境,注意到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五是发掘新资料。这原是大家通常注意的,在一九八〇年,我们看到又把它扩展到有关中外档案、公私碑志、著名园林寺院的布置结构以及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字和生活等等,都经过独立研究,用作探讨历史的论证。资料领域的扩大,又把研究领域加以扩大了。

六是树立新观点。由于上述五点的创新,必然导致出现与过去不尽相同的或进一步发展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不是有意标新立异,不是捕风捉影,不是主观想象,而是具体分析的新成果。

根据上述情况,所以我认为:一九八〇年我国史学界是繁荣的一年,是胜利前进的一年。在一九八〇年获得胜利的基础上,展望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学界,一定更是繁荣的、前进的;更能多出人才,多出成果。

我对一九八〇年历史学界的发展情况,了解不深,探索不够,可能没有抓住重点,存在不少错误。希望历史界同人加以指正。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

周 谷 城

不久以前，比较研究还不大有人提，因为有一种顾虑，恐怕有人讥为生搬硬套。其实比较研究并不发生“生搬硬套”的问题；恰恰相反，它只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获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一)用比较研究，即经常拿彼此不同的东西对照着看的意思。这样作，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例如“古典时期”一词，原来本只适用于希腊、罗马。但学者们为着要完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国、波斯等，也纳入古典时期之下。又如基督教时代，本只适用于欧洲，但为着完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便不得不把日尔曼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一律纳入一个过渡时期，即由古典的到基督教的过渡时期。此外为着同样的目的，不得不把阿拉伯人的兴起，说成入侵；不得不把世界联系的扩大，说成是欧洲的扩张；不得不把被侵略者的翻身，说成“白人的负担”。在“白人的负担”之下，竟列上日本的革命，中国的觉醒，非洲的征服等。如上所述这类情况，我们如果不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自始即读世界史，而不研究一点中国史，换句话说，即不拿中外历史对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作进一步的考虑，或更切合现实的考虑。

(二)用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较易看出：由古代到中世纪时，亚、欧、非三洲有些政治势力的发展，有由分区并立，倾向于往来交叉的趋势。我们研究世界古史，如果自始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为中心或为开端，例如以埃及或巴比伦为开端，就不易看出有并立的诸种政治势力。反之，却很容易看出，许多政治势力的分区并立；例如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势力，西亚巴比伦及波斯的势力，南欧爱琴海的势力，希腊、罗马的势力，东亚中国的势力，印度河流域的势力等，都是分区并立的。我在拙著《世界通史》第一篇里也曾列举了六个古文化区，即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区等。

分区并立是一方面，其反面必然是往来交叉。古代到中世时，亚、欧、非三洲各种政治势力的往来交叉是很显明的。如古代波斯势力的向西方发展；崛起于希腊半岛北部，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率领的希腊势力的向东方发

展；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回教势力的向西亚、北非、南欧发展；崛起于南欧的十字军的向西亚发展；崛起于蒙古的蒙古人向亚洲各地乃至欧洲许多地方发展，都是最显著的实例。这些实例，一方面证明分区并立的各种势力并不是静止的；另一方面则证明由古代到中世时，亚、欧、非三洲交通要道如何开辟的，贸易往来如何发展的，文化交流如何进行的。如果不用比较研究或对照看的方法，则不易看出其重要性；即使看到了，也不易从正面突出，给予应有的叙述。

(三)分区并立往来交叉是表面的外在的情况；与此同时，又有里面的内在的情况与它相应；这即由大体相似到极不相同是也。古代各文化区，都属奴隶制时代；无论埃及或巴比伦，希腊或罗马，波斯或安息，印度或中国，都是如此。社会阶级方面，都有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政治方面都有由城市王国到统一帝国的发展。尤其统一帝国的出现，几乎是普遍的；例如，有埃及帝国，亚述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安息帝国，秦、汉帝国等。凡此等等，都是很相似的；尤其各奴隶主帝国，彼此特别相似。

然而到了四、五世纪之时，东西两方，尤其中国与罗马，出现了民族大迁徙的运动。中国自晋惠帝永兴元年，亦即公元三〇四年，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亦即公元四三九年，前后一百三十余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从西北部进入晋帝国。罗马自三世纪之末到五世纪初，即有所谓蛮族从东北向罗马移入；到五世纪之末，正蛮族大举移入之时。东西两方，民族迁徙的事实，固很相似；其时间亦相距不远，都在四、五世纪时。特别巧合的是东西两方的帝国，都在这期间处于分裂状态：东方的晋帝国，曾分裂为北朝与东晋；西方的罗马帝国，亦正分裂为西罗马与东罗马。这可能是东西两方民族迁徙的原因之一。迁徙的原因，迁徙的事实，以及迁徙的年代，都很相似；然而发展的结果，东西两方，却极不相同。中国方面，从西北移入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虽曾在晋帝国内，先后建立过所谓“五胡”的十六国；然不久即消灭于无形，继起者仍为统一帝国，如隋帝国及唐帝国等。罗马方面，则完全不同，从东北移入的所谓蛮族，也建立了许多或大或小的国家；然而在这些国家的基础之上继起的，却不是统一帝国；恰恰相反，而是许多不同的民族国家！中世纪世界史上这一不同情况，凭比较研究，可以看得很清，且可引起我们的考虑；若只注意一方，而不拿另一方对照着看，则完全不能看出。

(四)由大体相似发展到极不相同的事例，在世界史上，并不是孤立的。中世后期，中国与欧洲都有海外活动，海外活动可能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也都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继续发展。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都需要专制政治，事实上也都促成了专制政治。然而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结果是中

国与欧洲极不相同的：即欧洲曾有盛极一时的重商主义，中国却没有出现重商主义，这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考虑。公元十五世纪上期，中国早于欧洲几十年，就有海外活动；最显之例，为郑和七次出使所谓西洋。这种伟大的活动，既表现了当时中国的富足，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及东非沿海诸地的贸易往来，培植出空前的专制政治。这情况与欧洲类此的情况是很相似的。欧洲在十五世纪下期到末叶，开始有人进行海外活动，公元一四九二到一五〇三年间，意大利人哥伦布，得西班牙女王伊沙白拉之助，先后四次航行到中美等地。在此同时及其前后，更有人从欧洲沿海出发，绕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也有人从欧洲沿海出发，绕非洲南端进入太平洋。最后终于有人在一五二二年完成世界一周的航行。此后欧洲经济进步，国内外贸易发展也终于培植出空前的专制政治。由海外活动到国内外贸易的加速发展；由国内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到绝对专制的空前发达，中国与欧洲是很相似的。然而最后一个很大的结果，两方却完全不同：欧洲自十六世纪以后，盛行“重商主义”，中国的重商主义却没有出现！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五)欧洲的重商主义，广泛一点说，可以说是一种致富与图强的主义；是民族国家成长，专制政治发达的最后成果。民族国家与专制政治的成长发达，颇得力于商人。商人与国家，与政府，立于一边；一方面肃清地方主义，发展工商各业；另一方面发扬国家权威，促成海外贸易。对内对外活动的目的，都不外致富和图强；致富和图强，又相互为因果：要致富便须图强，要图强便须致富。所以重商主义可以说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致富图强主义。其活动于海外的各国人，首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其次为荷兰人；最后为法国人、英国人。严格说来，不能把先后分得如此明确；不过从彼此势力的消长或盛衰看，大体是这样的。葡萄牙人于公元一五一七年曾到日本；一五四二年曾到中国的广州，于是他们在欧洲与亚洲各大国之间，树立了直接通商的基础；他们垄断欧亚之间的贸易，达一百多年。西班牙人的海外活动与葡萄牙人恰恰相反：葡萄牙人所接触的为亚洲的文明古国，如中国及印度等；西班牙人所接触的则为美洲落后民族，如中美及南美的土人等。葡萄牙人到东方，主要目的在夺得香料贸易的霸权；西班牙人的西进，主要目的则在获得金银矿产的独占。荷兰人在东方与葡萄牙人竞争；自从一五九五年商业舰队绕好望角东行以后，一天一天发展；到十七世纪上半期达于全盛。他们一方面压倒葡萄牙人的东方商业势力，另一方面则打击英国人在印度的贸易发展，并进而与中国及日本直接通商。法国人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代，与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等的贸易关系都很密切；与新大陆及东方的贸易，也

在这时大大增加。他们的海外政策主要为鼓励出口，奖励造船，垄断运输，及大力支持对外贸易的各种大公司。英国人在各个商业帝国的海外竞争中，实为最后的胜利者。英国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凡可分为三大方面：在新大陆方面，北美、中美、南美很多地方都为他们的商业中心；东方则以印度为中心，一六〇八年时，竟以商业势力完全征服印度，并垄断着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在非洲方面，几内亚沿海诸地，全在他们的商业势力范围之内。他们在海外的商业势力这样大，需要出口的商品特别多，终于引起国内的产业革命，在世界史上成为最先进入近代史时期的国家。中国与欧洲比较，情形恰恰相反：一点点重商主义，刚刚萌芽，即被从欧洲发展，弥漫全世界的重商主义所压倒。

(六)当中国尚停滞在中世前期封建地方主义全盛之时，欧洲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已进入了中世后期弥漫世界的重商主义时代；尤其在葡、西、荷、法、英几个商业帝国互争雄长之时，英国竟抢先进入世界史的近代阶段，首先发展产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驱。在这过程之中培植出一辈新人，叫做资产阶级。出现了生产以剥削为目的的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又产生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或文明。所有这些，与我们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因为我们的情况，既没有完成过重商主义，也没有完成过产业革命，更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有一位中国学者写中国哲学史时，说中国哲学史上没有近代阶段；其实即中国经济尚未进入近代，尚未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毛主席曾说过，我们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可见历史的发展虽有阶段可循，然时期的到来中外并不平衡，先后并不一致。

(七)讲到这里，我们应该谈一谈中外历史分期的比较。这里有两个较大的分期问题：一是古代的，即奴隶制时期与封建时期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什么时候；二是近代的，即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什么时候。关于前者，我根据阶级剥削程度有不同的原则，和全局可能决定部分的原则，把中国的奴隶制时期与封建时期的分界线划在西汉后期；为着有一个固定的年代，即以王莽篡汉之年，即公元九年为分界线。在奴隶制时期，奴隶的整个人身都是奴隶主的；封建时期则不然，农民的身分是半自由的。但他们的农产品被地主剥削去的，至少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汉书·食货志》里说“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对这句话，如淳说“什税其五”，颜师古说，“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这种剥削关系，即产品对分或各半的关系，秦以前是没有的；故以西汉后期为奴隶封建两时期的分界线所在。其次全局对于部分常有决定或说明作用。古代许多文明发达的奴隶制国家，

其各自的历史现象,在各国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处:就社会讲,希腊、罗马、中国、印度都有工商奴隶主的出现,都有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就法例讲,印度有法典,巴比伦有法典,中国有法家,罗马的法学思想更特别发达。就学术思想讲,希腊有极发达的哲学思想,印度有佛教以外的所谓外道诸宗,中国有所谓儒、法、名、墨、道诸家。就宗教经典讲,印度有吠陀经典,中国有儒家经典,西方有犹太经典及基督经典,波斯有祆教经典等。彼此之间的现象如此相似,中国所具有的种种,也必属于奴隶制时代,而不是封建时代的。依全局决定或说明部分的原则,我们似可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东汉,或公元开始以后,因其他各国的封建都在这期以后也。

至于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在欧洲方面,现在的学者认为在英国所谓光荣革命之时,亦即公元一六四二年。就社会发展史讲,一六四二年以后,英国的产业革命固已开始了,资本主义亦在大发展;以这个时期为分界线,是可以的。我们的近代史的分界线则与此不同,定在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之时。这一点,西方学者有的不以为然,以为不符合社会发展史的分期,而主张把我们近代史的开始定在明朝,甚至有主张定在宋朝的。但宋、明既不是中国产业革命开始期,也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期。我们把中国近代史之起头定在公元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这一年,是以反抗外国侵略为标志的;而且,在这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才有比较显著的发展。鸦片战争爆发之时,革命导师就有西方落后,东方前进的说法,亦即着眼在反侵略。我们定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依社会发展史为标志,固符合马克思主义,依反抗外国的侵略和压迫为标志,更符合马克思主义!

(八)反抗侵略和压迫,固然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同时也是近代、现代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国家或民族争取独立的主要任务。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被压迫的国家争得了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争得独立的国家就更多了。一九四五年十月,联合国成立时,签字加入者只有五十一国;到一九七八年底,联合国的成员已增加到了第一百五十二个,足证被压迫国家或民族反抗侵略和压迫,取得成功,获得独立者之多。过去西方学者中虽有人说,日本的革命,中国的觉醒,非洲的征服是“白人的负担”,今天则大不同了:全世界反抗侵略和压迫的人民或民族或国家正在走向团结,奋勇前进,争取创造建设世界的新经济秩序。不独止此,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中,也有对西方或欧美以外表示要另眼看待的人。一九七五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和耶鲁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合编了一部世界通史,其序言有一句,认为西方比西方以外各地都高一等的思想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深信世界并不永远是铁板一块;相

反,争独立,争自主,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或民族或国家正在日益增加。所以我们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调整经济,进一步安定政治,努力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以外,力争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在国际方面,力争团结反霸,促进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新经济秩序,是完全正确的。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历史,势不能不这样作。

要认真读点书

白寿彝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陈垣先生百年诞辰。十二月,顾颉刚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两位老先生,我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动了,是他们治学的功力,是他们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治学的功力上,在读书的认真上,能赶上他们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年辈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认真读历史书,也很少认真读马列主义的书。多年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读书不认真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顾炎武有一段话,曾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顾炎武不是反对铸钱,而是反对把很好的旧钱改铸成很不好的新钱。我常想:我们史学界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形,是否有不肯入山开矿,而乐于把一些成品、半成品随意剪裁成文,既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而又只能制成不象样的东西?我们在写讲义、编教材的过程中,这种情形是否出现得更多?我认为,想想这个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对于我们的治史工作是有益的。

历史的本身跟人们写出来的历史是有区别的。写出来的历史,包括历史的记载和经过系统整理的史书,并不等于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客观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能招之使来。我们研究历史所凭借的资料,除了古器物和各种文化遗存,主要靠写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读书,不能不认真研究前人留下来的史学遗产。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以才、学、识为史家三长。才,指文才。学,指学问。识,指见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主要是指对于史事的

忠实。这四者，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历史工作者都还是必要的。我想，识和德也可以合在一起，叫作器识，它包含见识、气度和抱负。这一条，对于一个优秀的历史工作者的要求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真读我国史学名著，如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既要注意从才、学方面吸收营养，也要从器识方面吸收营养。研究中国史的，还应该读一点外国的史学名著。研究外国史的，也应该读一点中国史学名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的理论武器，我们更应该认真地读。经典著作的分量大，读起来，难度也大，我们可以有选择地读，但必须精读。经典著作中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哲学笔记》，都是不易攻读的，但对一个历史工作者说，还是要下工夫来攻读这些著作。我们要提倡读经典著作的原著。所谓原著，是指原文本的著作。如果外文不行，也要认真读译本。

五四以来，马列主义逐渐传播开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此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相继写出了马列主义历史书。邓初民、侯外庐写出了社会史方面的专著，侯外庐等还写了多卷本的思想史。对于这些同志的著作，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学习。五四以后，历史考据学也很发展，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在考据学上的成就都超过了乾嘉时期的学者，我们也应该读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考订文献的成果。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五四以来史学评议的课程。我认为开设这门课程的设想是很好的。我希望这门课程继续得到有关同志的支持，并加以改善和推广。

我想，我们还应该认真读当前出版的新书，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书，组织读书会。每次会议，可以以一部书为中心，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的意见，而不是挑眼。同这种读书会活动并行的，有关报刊可以多组织一些书评。组织读书会和组织书评，对于推动读书的风气、交流学术意见、指导青年学生进修，都是有益的。当然，实践起来不是没有困难，但我们想办法，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长期以来，我们高校历史系在指导学生读书方面很少下功夫，多半是在课堂上灌输，要求学生们“耳食”。研究单位，似乎也不重视认真读书，不重视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深厚的修养，而简单地重视找材料，急于进行具体的研究。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只要能认真读书，读一本就会得到一本的益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史学工作是会逐渐改变面貌的。当然，读书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现在来说，这确实是第一件大事。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刘大年

评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大多数都承认，三十年来进展显著。但也几乎众口一词，不满足于现状。因此，提出了从何处突破的问题。

对此可以有各种回答。例如说，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钻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高理论水平；或者说，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加强专题研究。无疑地，这些都是正确的回答。然而那一些并非一时的需要、一时的任务，任何时候都要那样做。根据目前的情况，是否也可以考虑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方面来寻找突破口？如果可以，我就觉得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研究，做了不少工作。严中平等同志统计、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部孙毓棠、汪敬虞编，另一部陈真、姚洛、逢先知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其他同志编辑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外债史、铁路史、海关史、货币史、钱庄史、民族火柴工业、民族毛纺工业、机制面粉工业、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等十几种近代经济史资料，都出版于那段时间里；专著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吴杰著）、《中国经济史略》（孔经纬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赵靖、易梦虹著）、《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孟宪章著）和湖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科书，等等。但总起来说，专题研究少，科学水平高的著作少，尚未动手整理的资料浩如烟海。最近两年来，清除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影响，得到一些恢复和发展，但从事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仍然很有限，显得不够活跃。一九八〇年全国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一共十多次，没有一次专门讨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八月间，中美学者在北京举行的宋明清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十二月，在长春召开的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都只涉及到中国近代早期的经济史。一九八〇年全国报刊杂志发表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达数千篇，属于近